

V 19.104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潮阳县委员会
《潮阳文史》编辑委员会编

第四辑

潮陽文史

趙棟初題



4
88

21



潮 阳 文 史

第 四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潮阳县委员会
《潮 阳 文 史》编 辑 委 员 会 编
1 9 8 8 . 1 2 .

目 录

人物春秋

郑正秋小考·····	郑儒新 (1)
蔡楚生与电影的民族化·····	蔡洪声 (10)
教育名流姚华萼·····	陈 原 洪笃生 (14)
倒袁将领胡万州·····	史 峰 (18)
柑桔专家郑树雄·····	姚作良 (20)
清末民初的开明人士郑雪桥·····	林晓光 郑白涛 (25)
热心办学 悉心育后 ——范家驹事迹片断·····	马东涛 (27)
蕖末塑艺人黄星阁·····	黄廷训 (30)

海外潮人

热心慈善事业的郑午楼先生·····	马哲民 (32)
鳄鱼大王杨海泉·····	郑 生 (34)

史料拾掇

潮阳蛋畚踪迹寻略·····	陈创义 (37)
潮阳县城气功史略考·····	姚存成 (39)
建国前潮阳各地的话剧演出·····	陈景明 (43)
民国时期潮阳水利建设·····	张 维 郑白涛 (48)
潮阳邮电史话·····	郑白涛 (50)

名胜古迹

- 丘逢甲的《重修大忠祠记》……………蔡金才 (52)
西岩墨迹忆故……………黄逸夫 (55)
河溪“十八古井”……………郑儒新 (57)

诗词篇

仰怀蔡楚生同志

——纪念蔡老逝世二十周年……………陈以我 (61)

潮阳西园咏……………陈以我 (62)

潮阳古迹题咏……………林 越 (63)

郑正秋小考

郑儒新

今年12月24日，是我国早期话剧、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——郑正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。

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影坛先驱者，本文试就有关郑正秋先生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考证。

至今为止，各种报刊、书籍对郑正秋先生的家乡、出生地、家庭情况，以及他的名字说法不一，多有出入。

《中国艺术家辞典》载：“郑正秋（1888.12.24——1935.7.16），著名电影艺术家。原名郑伯常，别号药风。广东省潮阳县人。自幼随父母客居上海。十四岁时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。后曾以正秋笔名，在《民呼》、《民吁》、《民主》等报刊上，发表以评皮簧戏为主的‘丽丽所剧评’，主张改革旧戏、提倡新剧，并表达他对当时腐败政治的不满。辛亥革命后投身于电影事业。……”

有人说：“郑正秋，原名芳泽，号伯常，潮阳人。1888年生于潮州，后随家人到上海，在上海进过私塾和洋学堂。他很早就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，曾以‘药风’为笔名发表剧评……”^①

也有人说：“郑正秋……是电影界的‘开国元勋’之一。他是潮阳沙陇乡人，早经商上海，酷爱文艺戏剧……”^②

还有人说：“郑正秋原名伯常……他博学多艺，为人正

派。25岁那年他来到上海，在上海从艺……”③

众说纷纭，孰是孰非？

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，笔者除参阅有关文章外，特地到郑正秋先生的家乡，访问了现在仍健在的几位认识郑正秋先生的老前辈，以及正秋先生在家乡的族亲们，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了查校。现在把初步收集到的资料，综合整理如下。

关于郑正秋的家乡

首先要说清楚的是，郑正秋先生的家乡，是广东省潮阳县成田镇的上盐汀村。

按一般填写“籍贯”的惯例，说“郑正秋，广东省潮阳县人”，是对的。如果说郑正秋先生是“潮州人”，从广义来说，也是对的。因为潮阳县古代隶属于潮州府。所以，上海人习惯上统称潮籍人士为“潮州人”。

至于说郑正秋是“潮阳沙陇乡人”，就明显错了。沙陇与上盐汀是两个村庄，两者相距约有10华里。

另者，说“郑正秋……生于潮州”，也不对。郑正秋并非出生于家乡。

关于郑正秋的家庭情况

郑正秋先生的祖父郑介臣，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之际，往上海经商，遂成巨富。郑介臣的商号名叫“郑洽记”，当时人们称他“洽记公”。郑介臣发迹之后，与潮阳县旅沪的成田溪东人、铜钵孟人、贵屿南阳人和其他潮籍人士，共同发起在上海建造“潮州会馆”。④

郑介臣膝下有四子：长子郑正卿，次子郑让卿，三子郑实卿，四子郑干卿。郑正秋的父亲排行第二。清光绪年间，他应顺天府（明永乐元年改北平府置。后为明、清京师。即今北京）试，中进士第三十一名，曾官任江浙盐运使。

是科，老三郑实卿亦中副榜（无出仕）。相传，当时“洽记”的门前竖有两副“旗竿夹”，二面旌旗同时上升飘扬，故有“双穗”（意为双丰收）之称。

关于郑正秋的名字

郑让卿生有二子：长名郑正秋，次名郑正忠。

“芳泽”是正秋的“字”，潮汕人一般称之为“书表”。⑤

“伯常”是正秋的别名。

至于“药风”，是郑正秋的笔名。1918年，郑正秋在上海创办“药风新剧社”。不久新剧衰败，药风新剧社解体。1919年，他又创办《药风月刊》。因而得名。

在先生的家乡，被访问的几位古稀、耄耋的老人，他们只识先生名为“正秋”，字“芳泽”，根本不知“伯常”、“药风”之称。

所以郑正秋就是先生的原名，他字芳泽，别名伯常，笔名药风。

关于郑正秋的出生地和启蒙处

郑正秋先生于清光绪十四年（戊子）十一月廿二日（公历1888年12月24日）出生于上海。其家庭住址是：十六铺的崇仁里。

七岁时，正秋随母亲回到家乡，住于上盐汀村老寨内的祖居（现存）。

正秋启蒙于家乡的私塾，地址是“仁裕”祠堂（现存）。

正秋在家乡居住二年许，九岁时又随母亲往上海（曾去过杭州），十四岁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。

以后，郑正秋长期客居上海，曾再次去过杭州，也曾再次回潮汕。

关于郑正秋的子女

郑正秋先生有三子一女。三个儿子名为：郑小秋、郑二秋、郑三秋，女儿名郑幼秋。

这里必须说明，在1923——1926年，郑正秋连续编导了《孤儿救祖记》、《苦儿弱女》、《好哥哥》、《小朋友》、《小情人》、《一个小工人》六部儿童故事片（其中编四部，导二部），成为我国这一时代儿童电影创作的代表人物；他的长子郑少秋，因主演《孤儿救祖记》等影片，也成为当时比较著名的童星，在中国儿童电影的历史上，留下了自己开拓的足迹。

关于郑正秋编导的影剧

郑正秋先生博学多艺，他的艺术造诣较深，从写剧评开始，到编写剧本，从导演、乃至亲自粉墨登台演出，对中国早期话剧、电影事业的发展，都有巨大的贡献。

1913年，郑正秋编写了电影剧本《难夫难妻》，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了这部影片（又名《洞房花烛》）。这是中国

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故事片。郑正秋、张石川也成了中国电影界的第一代导演。

尔后，在二十多年里，郑正秋先后编写、导演和参加演出以及撰写说明的话剧、哑剧、影片就有《隐痛》、《皇帝梦》、《桃源痛》、《中山被难》、《蔡锷》、《孙中山之死》、《姐妹花》、《再生花》……等数十部。^⑥他的作品对社会的影响极大，当时上海一带的人们，无不知郑正秋。

“每一新片问世，卒得影迷信心，凡习知国产电影者，咸能知各导演产物之叫座力，当首数先生也。”^⑦

特别应指出的，是1932年，郑正秋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组织“中国电影文化协会”后，他编导的《自由之花》、《姐妹花》和《再生花》，被誉为“三花出世，万人争迎，明星基础，赖以永固”。^⑧

《姐妹花》作于1932年，胡蝶回忆说：“记得这部影片在新光大戏院上映时，曾连续两个月‘爆满’，可以说盛况空前。”1935年2月21日至3月2日，苏联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展览会，《姐妹花》是我国参展八部影片中的第一部^⑨。该片当时不但受到国内观众的欢迎，在莫斯科也获得了好评。

关于郑正秋之死

1935年7月16日，郑正秋先生不幸病逝。

有人说他“因心脏病高血压在上海逝世”。^⑩

但根据当时吴吉人先生悼念郑正秋《白衣如雪哭先生》的文章看，似有出入。吴先生撰写此文的时间是1935年7月18日，即郑正秋先生病故后的第三天，对情况较为了解，故

特抄录有关部分于下：

“中国话剧，艺倾中外之郑正秋先生，不幸于前日（十六）辰刻遽归道山，噩耗传来，识与不识，莫不同声一哭，弥深悼惜。

……

“先生病海吐，上星期三^①，预‘中国艺鱼社’，叙餐于冠生园，归而泄泻，翌晨，继之以吐，点水不能下咽，热高102度^②，口噤不能声，亟延潮州和济医院谢、蒋两医生，断为伤胃，乃针治之。诘朝稍痊，吐泻均止，言亦不倦，热已退，且能进薄汤，方期可日见起色，何意至易簧前一日，蒋医谓其失眠将五六小时，非使其安睡恐有变，商之家人，予安眠药二片服之，服未片时即入迷乱状态，喉发细音，不辨何语。半日，神益急，气亦促，再延他医，云不救矣。计先生之病仅五日，延医仅两人，初万料其如是之速死。蒋之予安眠片，亦好心，又安知即死于两片药片耶。呜呼，惨矣！先生有子三女一，孙一，存年仅四十有八，一代艺人，遽失典型，闻者酸鼻，听者伤心，故昨日其门下士之间耗奔至者，莫不涕泪纵横，高呼痛失良导师也。他的早死无损于他的光荣。可是想到这惨淡经营的中国电影界，竟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推动者，我们是再也不能不加以哀悼了。我们追悼郑正秋先生，我们更为中国电影界惋惜！”

郑正秋先生逝世后，8月25日，由明星公司、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上海分会、广东旅沪同乡会、上海潮州会馆等三十余个团体联合发起召开“郑正秋追悼大会”。追悼大会在贵州路潮社举行，到会各界人士有两千余人，可见社会对这位电影界一代宗匠的崇高的敬意和沉痛的哀思。

据参加追悼大会的先生同乡人郑进德、郑容豪等几位老人回忆说：当时参加“郑正秋追悼大会”的人员，来回全部由上海的“云飞”和“祥生”两大出租汽车公司派车义务负责迎送（车前插有一面“郑”字的小旗）。送殡的车队所到之处，群众夹道，万人空巷，真是轰动一时。是日的午餐，则由“冠生园”免费供应，赠给与会者每人一盒奶油蛋糕作点心。

郑正秋先生的灵柩，安葬于上海闸北江湾的“潮州山庄”。

田汉为郑正秋作了挽联，联曰：

“早岁代民鸣，每弦管繁急，议论风生，胸中常有兴亡感；

谁人舒国难，正火热水深，老成凋谢，身后唯留兰桂香。”^⑩

注：

①见《中国电影的先驱者郑正秋——潮汕籍影坛名人之一》（作者：松桂），刊《汕头日报》。

②见《郑老夫子二三事》（作者：潮友），1986年3月20日《汕头工人报》。

③见《影坛潮籍名人郑正秋与中国早期电影》（郑鹤龄辑），1988年8月26日《汕头日报》。

④上海“潮州会馆”分有“阳会馆”和“阴会馆”。阳会馆馆址于“十六铺”，供初到上海的潮籍人民食宿；阴会馆馆址于“南草塘”，是为旅沪潮人亡故安葬的墓地。

⑤“芳”与“则”在上盐汀村郑氏的族谱中同一辈序。

这一辈人中族号以“则”字命名；表字以“芳”字命名。郑正秋
的堂兄弟多人，如郑芳俊、郑芳松、郑芳龄、郑芳熙……等。

⑤ 郑正秋影剧作品目录附后。

⑦ 见《白衣如雪哭先生》（吴吉人）。

⑧ 同上。

⑨ 1935年，中国在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上，参展的八
部影片是：1《姐妹花》、2《渔光曲》、3《桃李劫》、
4《大路》、5《春蚕》、6《重婚》、7《空谷兰》、8
《女人》。

⑩ 同注①。

⑪ 即1935年7月10日。

⑫ 这里指华氏度，约等于38.9摄氏度。

⑬ 见《新编对联集成》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
版、第140页《田汉挽郑正秋联》）。

附录：

一、郑正秋先生创作、编写、导演、演出的作品（包括
话剧、哑剧、电影）计有：《难夫难妻》、《隐痛》、《皇
帝梦》、《中山被难》、《桃源痛》、《蔡锷》、《恶家
庭》、《滑稽大王游华记》、《劳工之爱情》、《大闹怪剧
场》、《张欣生》、《孤儿救祖记》、《玉梨魂》、《苦儿
弱女》、《好哥哥》、《最后之良心》、《小朋友》、《早
生贵子》、《小情人》、《一个小工人》、《挂名的夫妻》、
《二八佳人》、《梅花落》（上、中、下三集）、《孙中山
之死》、《血泪碑》、《杨小真》、《黑衣女侠》、《侠女
救夫人》、《侠凤奇缘》、《山东马永贞》、《车迟国唐僧

斗法》、《美人关》、《火烧红莲寺》（第一集）、《女侦探》、《白云塔》（上、下集）、《战地小同胞》、《血泪黄花》（前、后集）、《桃花湖》（前、后集）、《红泪影》（前、后集）、《玉人永别》、《碎琴楼》、《娼门贤母》、《恨海》、《自由之花》、《春水情波》、《姐妹花》、《再生花》、《女儿经》、《热血忠魂》等数十部。

二、本文中的“引文”，均已注明出处。此外，参考的资料还有：

1.《起步不凡——早期的中国儿童电影》（作者：佳明），见《大众电影》1986年第6期。

2.《郑正秋编导中国第一部故事影片》（小瑾录自《人物》1983年第三期，作者：汪滴），见《汕头日报》“文史剪辑”。

3.《谁最早饰演孙中山》（吴名响摘自《深圳特区报》），见1987年1月5日《影剧文摘报》。

4.《胡蝶回忆录》，见1986年《南方周末》（连载）。

5.《中国影剧事业拓荒者郑正秋》（作者：黄更生），见1987年10月《潮阳文史》第二辑。

三、笔者访问对象：

郑进德：现年79岁，长期住上海，抗日战争爆发后回乡。

郑绍昌：现年80岁，曾在上海“郑洽记”当过店员。

郑容豪：现年74岁，以前居上海，曾在郑正秋家帮工。还有郑引舟（退休教师）、郑儒耀（退休教师）、郑桂兴，均是郑正秋的侄孙，他们原住上海，解放前后（1948——1951）先后回乡。

此外，还访问了郑芳松的夫人和郑芳龄的夫人两位老太太。

蔡楚生与电影的民族化

蔡洪声

今年是中国著名的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先生（一九〇六——一九六八）逝世二十周年纪念，本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辟“蔡楚生纪念专辑”，实在饶有意义。

蔡楚生的确是一位值得我们纪念的电影艺术家，这不仅是因为他在自己所走过的独特的艺术道路上，创作出了一批无愧于他那个时代的优秀影片，而且还因为他的创作道路和他的作品，都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启迪。

蔡楚生一向注重电影的民族化问题，他曾经大声疾呼地提出：“我们应该创作出这样的作品：这些作品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，使这些作品受到我国亿万人民热烈的欢迎和喜爱，并以此丰富国际无产阶级的文化宝库。”

蔡楚生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，对电影的民族化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，形成了他独特的鲜明的民族风格。

蔡楚生创作中的民族风格，首先表现在从中国广大观众的欣赏需要出发，善于在影片中插进复杂丰富的内容，溶入各种各样的形式；具有多姿多采、浓郁酣畅的特色。他解释说，他之所以形成这种风格，是由于“根据自己的观察，我认为我国劳动人民有着感情豪迈、热情粗犷的特点”，“他们需要笔墨浓重、感情奔放的艺术作品才能感到满足”，“我一直想尽力使自己的创作能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。”从

这一认识出发，蔡楚生在自己的创作中，总是力求做到内容丰富，色调多样。例如，在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中，既有对解放区的歌颂，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，又有对重庆“抗战中心”的讽刺；既有慷慨悲壮的动人场面，又有细腻缠绵的感情抒发；既是一出严肃的悲剧，不时又有着浓烈的喜剧色彩，有悲、有喜，悲喜交织……同样，在《南海潮》中，既有奔腾激昂的时代脉搏，又有独特的南方渔村风貌，既有海上的搏斗，又有恋情的抒发；既有历史，又有现实……成为一卷多采多姿的大书卷，琳琅满目。蔡楚生作品的丰富性，使之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，不但中国国内继续映播他的作品，而且一切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的国家和地区的观众，都在出神地欣赏他的影片。人们既可以直观地欣赏他所描绘的动人故事，欣赏他那风趣盎然的描写、揶揄嘲讽的笔触，从中得到艺术的享受；也可以从深层去探求他每一部制作所包含的意义，以及他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的把握，对民族感情和意愿的表达，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显示等等。

其次，蔡楚生创作中鲜明的民族风格，表现在他努力适应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，注重艺术结构的完整，几乎每部影片都见有“有头有尾，层次分明”的民族传统艺术的特点。蔡楚生认为，“作品应该写得‘有头有尾，层次分明’……我们中国人的艺术有我们自己的风格和习惯。我国的小说、诗歌，在事件介绍、人物出场、情节处理方面都是简洁而明了的，都是有因有果、层次分明、线索井然的。”当然，“有头有尾、层次分明，也不能被解释为繁琐、臃肿，重复地交代事件、交代过程，而应该是简炼和合乎需要的，能令人看懂的。”从这一认识出发，他在创作中不但为影片结构了复杂曲折的故事，为主人公安排了有重重险阻的

经历，而且吸收了中国民众所喜爱的古典章回小说的结构特点，从整体出发，缜密地安排故事情节，头尾连贯，前后呼应，让观众“看得懂，听得清楚，感到亲切”，即使是像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这样一部人物众多，描绘了绵延十几载，概括了整个抗战时期沦陷区和“大后方”各个阶层广泛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长篇巨制，作者同样处理得有条不紊、脉络清楚，四条线索通过男主人公张忠良纠葛在一起，然后又用交换和对比的手法，使情节一步深一步地展开。因此，广大观众易于清晰地辨别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，是什么人，在做什么事，思想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驰骋，感情随着人物命运的变化而起伏，从而自然而然地受到熏陶和感染。

蔡楚生对镜头的运用，也同样注重适应中国民众的欣赏习惯，他善于用镜头间的组合，表现空间连续性和整体性，表现动作的衔接和连贯，用以有条不紊地叙述故事，铺排情节，刻画人物。他特别善于运用镜头的组接，使两个含义截然不同的细节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例如，在《渔光曲》中，女主人公小猫流落上海拾破烂的时候，因受流氓的欺侮，气愤地跑到高楼底下的垃圾箱旁，抓起一把炉灰把自己和弟弟的脸儿涂脏，接着便出现这样的镜头：就在这座楼上，富家的女人正对着镜子涂脂抹粉，打扮得妖里妖气。在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，则有两个发生在同一夜晚的细节对比，逃到重庆的张忠良在交际花王丽珍的引诱下堕落，投入王的怀抱，而他的妻子李素芬却在上海一个残破的小楼上，在狂风暴雨中经受着痛苦的煎熬……，这种对比手法是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的，既深刻地揭示了生活本质，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

应该说明的是，蔡楚生创作中的民族风格，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，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拿

来硬套，例如，就电影形态而言，蔡楚生的作品均属于“情节电影”，而且有的作品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“情节电影”的高峰（如《渔光曲》、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）。相信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情节电影仍然是中国电影的主流，这是由大多数中国人（包括现在在幼儿园的孩子们）的欣赏习惯所决定的，然而，这并不等于说，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只能包容一种结构，一种形态。自七十年代末以来，有一批中国电影导演对“心理结构”、“情绪结构”、“间离结构”、“散文结构”等等进行了探索；八十年代初，出现了“求真不求戏”的“纪实风格电影”，近几年，若干着意于突出影像内在表象功能的影片的诞生……这一切，不仅适应了当代中国观众多层次的审美需要和娱乐需要，而且也将一定程度上拓宽人们对中国电影民族风格的思考。

蔡楚生生前主张中国电影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，同时，也赞同创造出多样风格的好影片来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。我相信，对子蔡楚生创作的回顾和纪念，必将有助于中国电影的发展。

（本文作者为潮阳县铜盂镇玉窖村人。作家、电影评论家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编审。）